

广汉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目 录

• 星星之火 •

难忘的西川岁月……………礼广贵(1)

蒋春信同志回忆录(片断)……………刘楠松整理(24)

• 海峡两岸 •

巨星的殒落

——悼诗人覃子豪琐记之一……………彭邦桢(29)

跨海诗人覃子豪……………张白帆(36)

雒水悠悠育诗人……………缪恒苏(39)

一帧挽联祭诗魂……………荻青(41)

读台湾诗人覃子豪遗作有感……………杨熙(43)

(七绝五首)

诗歌座谈会口占……………李君炜(44)

大地在动……………张人士(45)

• 人物春秋 •

侯橘园……………县志办供稿(46)

张邦伸传略……………县志编写组江达川整理(49)

• 杏林漫步 •

广汉县医院的变迁(上)……………杨进(52)

广汉县血吸虫病今昔	罗孔昭(59)
· 文物古迹 ·	
三星堆话古	敖天照 刘雨涛(63)
龙居古刹	蔡兴仁 敖天照(73)
· 文史钩沉 ·	
汉州八景	丁辉耕(77)
蜀中名酿数鹅黄	丁辉耕(79)
叙伦园	向启杰(80)
· 能工巧匠 ·	
李宽裕	何雅宜(83)
王润之的木结构建筑	何雅宜(85)
· 土特名产 ·	
手工挂面	向启杰(88)
· 菜圃花苑 ·	
雒城地区蔬菜生产概况	曾广泽(98)
广汉花卉今昔	邓启明(103)
· 诗词集萃 ·	
覃汉川诗词选(续)	覃汉川(106)
· 补正释疑 ·	
关于《新修广汉公园碑记》的补正	编者(110)
· 文史信息 ·	
《广汉文史资料选辑》征稿	政协广汉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11)

难忘的西川岁月

——成都西川书局及其七处分店的始末记

礼 广 贵

1945—1946年在地下党领导下，我和张孝先同志一起，团结一批进步青年朋友，在川西坝子先后创办了绵竹县中原书局、德阳县和平书局、金堂县新德书局、罗江县启民书局、孝泉镇新群书局、淮州正义文化服务社、西川书局赵镇分店等七个县、镇书店和成都西川书局。这一批进步文化事业，对在国统区发行党刊，宣传革命文化，传播民主思想，团结进步青年，开展人民民主运动，都起了一定作用。1947年，解放战争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在国统区摇摇欲坠的法西斯统治，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疯狂镇压。五月初，我在同志们的掩护下，逃脱了特务的搜捕，转入东北解放区。在“六·二”大逮捕中，这八处书店先后被特务捣毁封闭，有四位同志被逮捕，其他同志转向其他战线，在地下党领导下继续坚持人民民主革命斗争。

一、书店创办的历史背景

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始终顽固坚持其一党独裁统治，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进入抗战后期，国民党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更加尖锐突出，四

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国统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局面更加严重。1944年，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全面反攻，墨索里尼垮台，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而在国民党战场，日寇突然发起湘桂战役，国民党百万军队节节败退，一溃千里，贵阳危在旦夕，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彻底腐败无能的真象大白于天下，国人无不愤慨异常，同盟国领导人也公开表示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和失望。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这时正迅速走向高潮。

九、十月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举国上下，朝野内外，一致赞同。党明确提出在国统区的任务是：“……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论联合政府》）而加强国统区党在宣传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正是这个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党在重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报导解放区军民生产建设的情况和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它不仅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与进步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和读者，而且对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起了政治思想上的指导作用。它象一把刺在敌人心上的尖刀，敌人无时无刻不想拔掉它，又象茫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引导国统区人民投身革命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限制和破坏《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而广大读者则迫切希望能按时，及早看到这张报纸。当时《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

虽呕心沥血，采取各种伪装办法邮寄报纸，保护读者，但外县、镇订户仍很难按时收到报纸，有时一个月只能收到几张，至于《群众》杂志以及其它进步刊物，就更难与外县读者见面了。

成都西川书局和四县三镇的七个进步书店就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创办起来的。

二、在党的领导下创办外县、镇书店

我是东北流亡学生，曾就读于东北中山中学，1939年夏，东北中山中学发生以“动社”成员为核心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学潮，在支援这次学潮中，自流井学生会领导人谢韬（谢道炉）同志与我相识，1944年谢韬因在成都“市中事件”中暴露，地下党将其转移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我们两人始终保持密切联系，1942年初，我从西北大学来到成都，在时有恒同志任经理的成都祠堂街“未名书铺”当店员。此时，谢韬同志曾向我传达过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关于要在大后方开展群众运动，要独立作战和“三勤”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1942年8月，为广泛接触青年学生便于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在谢韬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下，我转到广汉中学任教。一年后，该校以我思想左倾为由不再续聘。1943年暑假我转到广汉私立力生中学任教。在此期间，我每月都要到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分处找唐晋同志取报。并与谢韬同志见面。当时，谢韬是地下党领导的“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的宣传部部长，1944年经谢介绍，我认识了成都联营书店经理倪子明同志（中共党员，受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后转川康特委）。在此之前，我还结识了中共党员苏兮

麟（西林）同志，苏的公开职业是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图片部的工作人员。

我在广汉两个中学连续任教三年半。与李馥春（蒙筭）、李刚（兰河）一起进行学生工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大约有二十名左右。我们深感这一工作的效果不大，经过反复研究，从1943年下半年起，我们依靠张人杰等进步学生开始在广汉同学中和社会上推销和订阅进步报纸的工作。公开订阅的有成都《华西日报》、《华西晚报》、重庆《新蜀报》、《国民公报》、《大公报》等进步或比较中立的报纸，暗地里则秘密推销《新华日报》。张人杰的家“庄家祠”一时俨然成为一个报纸发行站，张的母亲庄绪如积极支持和参与了这项进步报纸的发行工作。我们要借此扩大党报的政治影响，提高我们的群众工作效果。

1943年暑假，经过广汉中学进步学生刘继尧介绍，我认识了金堂县的进步青年曾天银，后来经过曾更广泛地结识了金堂县的一批进步朋友如林伯渊、秦季忠、龚思雪、吴江月（龚、吴都是中共党员）、苏枚、雷通哲、兰坤泽等以及广汉的缪恒苏（诗人），陈道钊等。不久，经过林伯渊介绍又认识了广汉县的进步青年张孝先，张当时在广汉县经收处任小职员，他家境贫寒，交游广，朋友多，联系群众，工作热情高，以前曾在金堂大华书店当过学徒和店员。到1944年夏季，我和广汉、金堂两县的进步朋友都有了联系，而且还和张孝先把绵竹、德阳、赵镇等地的青年朋友也联系起来，加上广汉、罗江的二十几名进步学生，有了相当一批群众。这时，我们的工作方向已从学生工作扩展到社会青年中去，工作地区也从广汉扩展到川西几个县，这就为后来西川书局

等八个书店的创办准备了干部，打下了基础。

当时川西外县很少书店，有的也主要是卖春秋两季教科书或学习文具，平时则在书店聚赌或“打围鼓”。读者订报也多是邮寄，说到革命文化，如成渝等地进步报纸期刊和三联等进步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及革命文艺作品，外县书店几乎一无所有，那里真是一片荒漠地带。而在这几县内，有从沦陷区内迁的铭贤中学、国立六中和各县的中学、女中、师范等，师生人数何止万千。他们很难买到进步书刊报纸，他们如饥似渴，迫切需要革命文化和进步思想的滋养，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和张孝先等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心想，如能把进步书店开到外县、镇去，这不是解决了广大读者阅读党报党刊和进步书刊报纸，扩大党在外县的政治影响的紧迫要求的最好办法吗？于是我专程去成都，分别向倪子明、苏兮麟同志汇报请示并谈了这个想法，他们表示完全赞同，倪子明还指出：成都联营书店和《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的主要读者都在城市，服务面较窄，如能在外县开书店，对把党报党刊发行到基层去，扩大进步文化阵地，配合民主运动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方向完全正确。苏兮麟还强调：这也是培训、锻炼革命青年的一个好办法。对如何创办外县书店，他们还提出一些意见。我回到广汉，立即向张孝先、李馥春、周澈之等同志传达，经研究后，决定从以下几方面积极开展书店的筹备工作。

（一）先从有条件的县城、镇开始，取得经验，再逐步发展；

（二）依靠当地的思想进步，热心文化事业，有办事才

能的青年朋友出面主持店务，担任经理，并就地物色思想开明、有一定声望的人士担任董事长，这对掩护书店工作有利；

（三）利用当地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募股，就地解决开办书店的资金问题；

（四）书店性质及经营方向应以经售及发行进步书籍、杂志、报纸为主，但也不要搞得太红，张恨水等的言情小说也可摆出卖，但不可太多，也可销售教科书和文具。

推销报纸，主要是《新华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民主报》等进步报纸，但成都《新新新闻》和重庆《大公报》等也不排除，以便于掩护。

（五）店员要慎重选择，防止坏人混进来。

于是从1945年上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依靠当地进步朋友和广汉、罗江这批进步学生的通力合作与艰苦奋斗，在倪子明、苏兮麟等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在成都联营书店、开明书店（经理章雪舟）和《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先后在绵竹、德阳、金堂、罗江四个县城及孝泉、赵镇、淮州三个大场和成都共办起了八个进步书店。

两年来（从1944年起）我一面在力生中学教书，一面在广汉派报，在外县搞书店，这些革命活动引起了广汉县长及国民党、三青团的严密注视，他们要对我下毒手，力生中学校长陈守清（广汉兵变时的党员，当时组织关系未接上）得悉，立即转告我马上撤离广汉。1946年1月，我回到成都，全力投入书店工作，为了加强对县、镇书店的领导和扶持，我与张孝先（早已辞去广汉县经收处的工作）、周澈之（初

中毕业，即放弃升学的优越条件，跟我搞书店工作）等同志一起，决定创办成都西川书局，做为外县镇书店的“总管理处”和“总经售处”。倪子明、苏兮麟同志对此表示完全赞同，积极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倪子明向《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主任杜桴生同志介绍过成立西川书局的目的和宗旨，并引我与杜见面。杜桴生认为，向外县推销《新华日报》、《群众》杂志，是符合当前扩大党在外县的政治影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民主运动发展的要求的。我们对今后西川书局与《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在工作上如何合作，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具体分工。倪子明还向他的领导人川康特委书记马识途同志汇报过西川书局的情况。

成都西川书局由我任经理，张孝先同志任副经理、会计及外县书店的巡视检查工作，周澈之同志主管营业、出纳及送报工作，周一直工作到西川书局被迫结束为止。

为了加强党对西川书局的组织领导，倪子明同志对我进行了近两年的认真考察，经领导批准后，于1946年1月介绍我入党。党内分工，倪子明让我负责领导西川书局和外县书店的工作并向倪做汇报，同时倪还让我担任“成都市职业青年的联谊会”（倪子明任主任）的组织委员，西川书局职员周澈之同志任组织干事。在参加“职联”、成都市民主运动和青年学生工作中，我同地下党汪寿康同志（当时在成都建国中学任教）建立了联系，汪对西川书局及外县书店工作给予积极指导和支持，当苏兮麟同志随美国新闻处迁北京，倪子明同志被特务追捕奉命撤离成都以后，在白色恐怖下西川书局艰苦撑持的最后阶段，汪寿康、肖华清同志根据地下党指示，及时给书店以具体指导，并协助将书店工作人员全部转

移出去，使书店免遭更大损失。

三、西川的战斗生活片断

（一）1946年1月，我们到成都创办西川书局时，是赤手空拳，毫无资金的。在中共地下党员倪子明、苏兮麟（西林）的直接领导和全力支持下，我们也就白手起家地干了起来，没有办公室、宿舍和仓库，倪子明就将联营书店的宿舍挤出两间转“租”给西川，没处吃饭，就让西川工作人员参加联营书店的伙食团，没有家俱、图书，苏兮麟就将他搞书店（与地下党员吴寄寒、马素琴共同创办，后因吴被调走而停业）的办公桌、椅子、书架和全部图书移交给西川做底垫。虽然找不到门市房，但由于工作要求至急，也就这样因陋就简，很快开张营业了，地址在成都祠堂街牌坊巷15号楼上。西川书局成立后，立即承担起外县书店的“总经售处”、“总管理处”的任务。

（二）为创办这八处书店，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和学生，抛弃有一定收入的原来职业，到书店担任经理、会计或送报工作。如刘家农（原绵竹一山货店的帐房先生）、卢尔庄（原德阳的中医大夫）、冯争先（原成都春熙路一家大绸缎庄的会计）、吴江月（原在淮州经营油房、糖栈生意）、李升普（原在淮州开中药店）、林伯渊、曾天银、刘继尧、彭代述、李成松、李振芳、张孝芝（原都是小学教师）、郑弼、范荣锡（原高中毕业生）、张孝理、赖叔全（原简师学生）等同志，这里面有孝先的胞弟、堂妹，一经我们宣传动员。他们都见义勇为，不计得失，为创办革命文化事业，为一个共同理想，坚定地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从此，风雨同

舟，患难与共，这极大地激励和感动了我们，这一切充分表现了那一代青年为革命勇于献身的无私、纯朴的高尚情操。

（三）地下党指示我们的方针就是把进步书店开到外县、镇去。西川成立前，在绵竹县、德阳县、孝泉镇已创办起了三处书店。西川成立后，不到半年时间，先后又在金堂县赵镇、淮州和罗江县开办起四处书店。西川副经理张孝先负责分管这七个书局，巡回检查，常年奔波在外，这是“总管理处”给予外县书店的一点实际帮助。在川西平原开办书店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坚持进行，1947年4月，张孝先奔走在中江、三台、盐亭等县间筹办书店。惜时局迅速逆转，内战全面爆发，白色恐怖加剧，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四）发行党报党刊，推销进步报纸是外县书店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内容。为了争取当天报纸当天到，改变原来今天看昨天报的状况，西川书局想尽一切办法，把可能动员的进步朋友都拉来参与其事。我的朋友成都市盲聋哑学校教务主任，川大进步学生李策同志（现四川省记协书记）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每天起大早，骑车跑《华西晚报》、《新民报》等报馆，与一群报童推揉着，取出报来，将《新华日报》、《群众》、《民主报》裹在中间，然后火速直奔北门汽车站，赶德阳的班车（当时一天只一班），德阳收到报纸后，立即转孝泉、绵竹。送完报李策急忙赶返学校上课，他每天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心甘情愿地去完成取报送报的神圣使命，而书局却没给他任何报酬。赵镇的报纸则是派专人骑自行车送（当时还不通汽车），成都至赵镇一百三十华里，周澈之、王协湘跑过这条线。到金堂将报刊交新德书局后直奔赵镇分店，由赵镇再火速转运淮州书店。报纸当天送到，

书店信誉倍增，订户很快增加起来。

（五）外县书店资金不足，周转较慢，西川书局股金后来虽征集一些，但也十分有限，为了扶持外县书店的进步文化事业，倪子明决定联营书店（倪是经理）对西川书局实行赊销，书卖出后付款，卖不出的可退货的最优惠办法。这样西川书局对外县书店也照样实行赊销及退货。（成都其他书店对西川则是按常规一律一手提货一手交款的。）这是西川和外县书店在资金十分短缺的情况下，而仍能正常开展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川为外县镇书店源源不断的供货（赊销），它的“总经售处”作用也正好表现在此。

（六）西川书局虽自始至终经济一直陷于困境之中，但它除代外县书店经售书刊外，还坚持努力开展出版业务，它曾以“中原出版社”名义（无实体）先后出版三本书。在荣利印刷厂印刷《回忆罗斯福总统》、《肖红小传》（骆宾基著）在上海的进步杂志分期连载完。西川立即出单行本赶在上海之前。《回忆罗斯福总统》中《开罗会议》一节写宋美龄向罗斯福的阿谀谄媚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肖红小传》写一代女作家奋斗一生，不见容于旧社会，而过早离开人间的悲剧，内有一节写肖红临终前，为她酝酿已久的新《红楼》（记红军长征的壮举）尚未动笔而溘然长逝所表现出来的莫大遗憾和惋惜。《民主大合唱》是由我选编的进步歌曲集，共选26首歌曲，分五部分：一、庆祝抗战胜利的4首，如“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带来了一切”。二、反对内战的5首，如“歇手吧，不要自打自”、“弟兄们，赶快放下枪杆！”。三、悼念革命战士的歌6首，如“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即“四·八烈士悼歌”）”、“洗星海纪念歌”、

“邹韬奋先生挽歌”、“愤怒的火焰”（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悼歌）。四、歌唱民主的4首，内《民主大合唱》一首包括7个组曲，（1）东方的暴君；（2）民主的浪潮；（3）农村的感伤；（4）都市的控诉；（5）两个人类；（6）我们是人民；（7）真正的胜利。五、时事讽刺歌曲7首，如“茶馆小调”、“古怪歌”、“王大娘补缸”、“黄鱼满天飞”、“朱警察查户口”等。这本歌曲集，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勾结美帝，大打内战的法西斯罪行，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强烈愿望。这本歌曲集，对国统区的进步歌咏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是有力的歌颂和支持。海星合唱团曾多次举行群众性歌咏大会演唱这些歌曲。在各阶层群众，尤其是广大知识青年和学生中，那些时事讽刺歌曲得到更广泛地演唱。现四川省博物馆革命文物展览厅内陈列了《民主大合唱》这本歌曲集。1946年初，在旧政协闭幕式上，蒋介石被迫不得不宣布所谓“四项诺言”，内有保障出版言论自由一项，蒋虽言不由衷，说说了事，根本没准备兑现，但进步的文化出版界却抓住他的“诺言”，大造舆论，将国民党政府的图书审查制度弃掷一边，不屑一顾。当此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前夜，一切有利于反蒋反美的书刊报纸，就是要抓紧时机，多出书，快出书。西川书局这三本书就是利用这一时机，适应这一斗争的总要求而出版的。

（七）西川书局还动员它的全部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当时成都市的民主运动，他们都是“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成都市民主妇女联谊会”的成员，“联职”举办的时事座谈会，反美反蒋反内战的示威游行，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会

（并参加布置会场工作），沈星海逝世纪念会和“海星合唱团”举办的进步歌曲音乐会，以及内部的时事报告会等，他们都积极参加。1946年夏，经倪子明、林友民同志推荐，我每天拿一半时间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工作，担任图书期刊部负责人几个月。在此之前，营业分处只经营《新华日报》订购业务，为适应当时民主运动发展的需要，我帮助建立起图书期刊门市部，读者踊跃，影响较大。周澈之还一度做过《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的送报员，每天往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送报。1946年秋，经吴汉家同志介绍，我被肖华清同志指定担任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分部的组织委员会委员，同时兼第40区分部的小组组长，我先后介绍张孝先、周澈之、张孝芝、金续良、曾佑钧、王茂华、谢惠之等四川工作人员和进步朋友加入民主同盟。西川书局和《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联营书店、现代书报社、开明书店保持战友般的亲密关系，业务上互相支持，一同参加民主运动。

（八）西川书局还是广汉在成都读书的一批同学接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民主运动的重要场所。他们都是我教过的学生，有些是周澈之的同学和朋友。西川书局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每逢星期天或假月，他们就到牌坊巷来找我，我给他们讲时事，让他们读《新华月报》及其他进步书刊，还介绍思想觉悟较高的进步同学如张祖沁、丁超遼、邓明儒、朱伯英、刘先弟、黄作孚、范育才、任作普、袁官铤、杨世曙、胡安才等认识方然（与我在地下党同一小组，方分管学生工作），他们给方然参加编辑的地下党主办的《学生报》写稿，逐渐和成都市学联建立直接联系。我还根据“三勤”指示精神，告诉他们要读好书，多交朋友，组织读书

会，在同学中扩大进步影响。在日益高涨的成都市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运动中，这批同学和西川工作人员一起踊跃参加，他们和汪寿康领导的建国中学进步同学还积极参加为西川书局出版的三本书及经售的《呼吸》等进步书刊的预订和推销工作。《现实新闻社》由林伯渊同志担任主编，黄作孚担任编辑。有的同学还参加了许寿真同志主持的世界语学习。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成都分会由周澈之负责，将其出版的《文艺学习》在成都和外县分发，并组织同学们写稿，经过西川书局的影响，这批同学的政治视野大为开阔起来，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在四川解放后他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九）正如千千万万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和革命工作者在“自费”干革命一样，西川这八处书店在创办过程中，同志们也是这样干的。如金堂林伯渊为创办新德书店，毁家纾难，卖掉60亩饱水田，德阳卢尔庄为创办和平书局也卖掉十几亩地，广汉学生陈德高卖掉几十石黄谷入股，王协湘、黄泽桂等也都入股较多，林伯渊、李振芳都把自己家的铺面房借给书店做门市用，没有同志们这种竭尽所能，积极入股的率先示范作用和影响，仅仅一年当中就搞起八处书店是根本不可能的。西川各店工作人员都能理解自己从事的革命事业的伟大意义和艰难险阻的处境。他们没有工资，不发服装，只给很少的零用钱（理发、洗澡用）能果腹就行了。1946年冬，西川书局经济情况更加困难，一日三餐靠萝卜稀饭度日，实际上连“半供给制”都赶不上，但大家为认定的革命目标工作，再艰苦也毫无怨言，表现出高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时在西川煮饭的张孝芝的么舅母，本是一个普通的家

庭妇女，她对西川的事业并不完全理解，但在这个艰苦、友爱的集体里耳闻目染，她爱上了这一群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而且爱得那么深沉，在他（她）们身上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她总是把萝卜稀饭煮得香喷喷，深情地看着大家把它一扫而光，自己每顿只吃很少一点。她象疼爱自己的子女一样，疼爱西川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一有空就给他们缝缝补补，遇到刮风下雨，她老念叨着外出人，担惊受怕。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么舅母”，她当了大家的“么舅母”。

四、国民党对西川书局的残酷迫害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西川”这样的革命文化事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它看作眼中钉，必欲除之后快，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由于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他们还不肯明目张胆地进行摧残，而以造谣、恐吓、或从经济上排挤等卑劣手段加以破坏；在内战爆发后，随着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对书店的迫害也就日甚一日，直至1947年的“六·二”大逮捕，对书店更是施加捣毁、抓人、追捕、查封等法西斯暴行，将书店全部摧垮。

绵竹“中原书局”一开始就受到特务的监视。开幕的那一天，国民党的县长、书记长，都夹杂在群众中来“中原”窥视，悄悄而来，悻悻而去。不久，就谣言四起，说书店是“共产党办的”，是“共产党的联络站”。四五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四川党部专门派人坐小车到绵竹，调查“中原书局”的情况，伪一二六师师部，也从广汉派人到绵竹会同军统特务陈志翰半夜到“中原”附近侦听，说书店内设有电台，把书店当做重点侦察对象，公开进行政治讹诈。

国民党反动派见政治讹诈没有奏效，便改而采取竞争的办法，妄图从经济上把我们的书店挤垮。绵竹的国华书局、金堂的新智书局、德阳的鸿文社以及罗江的集义书局等等，有的就是官方办的，有的虽名为民营实际受官方控制，他们都经营中、小学教科书和派报业务，与我们唱对台戏，进行激烈竞争。例如由伪县府向各中小学下令，指定到他们控制的书店去买教科书；动用汽车送报，与我们用自行车送报展开争夺订户的竞争。罗江的国民党当局还要阴谋，提出“启民书局”扩股，改选董事长、经理，实际上是把“启民”吞掉，改变书店性质，当即经理郑弼、董事长范荣锡识破，阴谋宣告破产。在绵竹、德阳曾发生董事长辞职的事，企图以此搞垮书店。

更令人愤慨的是为了破坏书店，国民党特务还要出一些流氓手段，如和平书局经理卢尔庄本是独生子，特务竟操纵保甲、想以“中签”为由抓卢去当壮丁，因遭群众反对才未得逞。赵镇西川书局分店经理李振芳、会计张孝芝都是年轻姑娘，特务常到书店挑衅或在书中夹字条以污言秽语侮辱她们。

国民党发动内战，剥去了假民主的伪装，向共产党和革命人士开始猖狂进攻，西川书局及外县书局便成了他们迫害的目标。1946年夏秋之交，西川书局周澈之去彭山县女中销售进步书刊，被该县三青团干事长发觉，大骂之后，继之以捣毁书摊，并勒令立即离开，在女中工友叶大娘掩护下周始得脱险。在和平书局，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在书架上东翻西找，并不买书，然后扬长而去，一天夜里，一群戴大口罩、黑眼镜、身背武器的人到书店强行搜查，并持枪威逼女会计